

何兆武文集

杂草集

何兆武著

西方思想史散论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杂草集

西方思想史散论

何兆武著

何兆武文集



北京大学出版社
PEKING UNIVERSITY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杂草集：西方思想史散论 / 何兆武著 .—北京：北京大学出版社，2019.1
(何兆武著作集)

ISBN 978-7-301-29963-0

I . ①杂… II . ①何… III . ①思想史 – 西方国家 – 文集 IV . ① B5–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233782 号

书 名	杂草集：西方思想史散论
	ZACAOJI: XIFANG SIXIANG SHI SANLUN
著作责任者	何兆武 著
责任编辑	刘书广 张晗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301-29963-0
出版发行	北京大学出版社
地址	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
网址	http://www.pup.cn 新浪微博：@ 北京大学出版社
电子信箱	zpup@pup.cn
电话	邮购部 010-62752015 发行部 010-62750672 编辑部 010-62755217
印刷者	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经销商	新华书店
	650 毫米 × 980 毫米 16 开本 * 18 印张 206 千字
	2019 年 1 月第 1 版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69.00 元

未经许可，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。

版权所有，侵权必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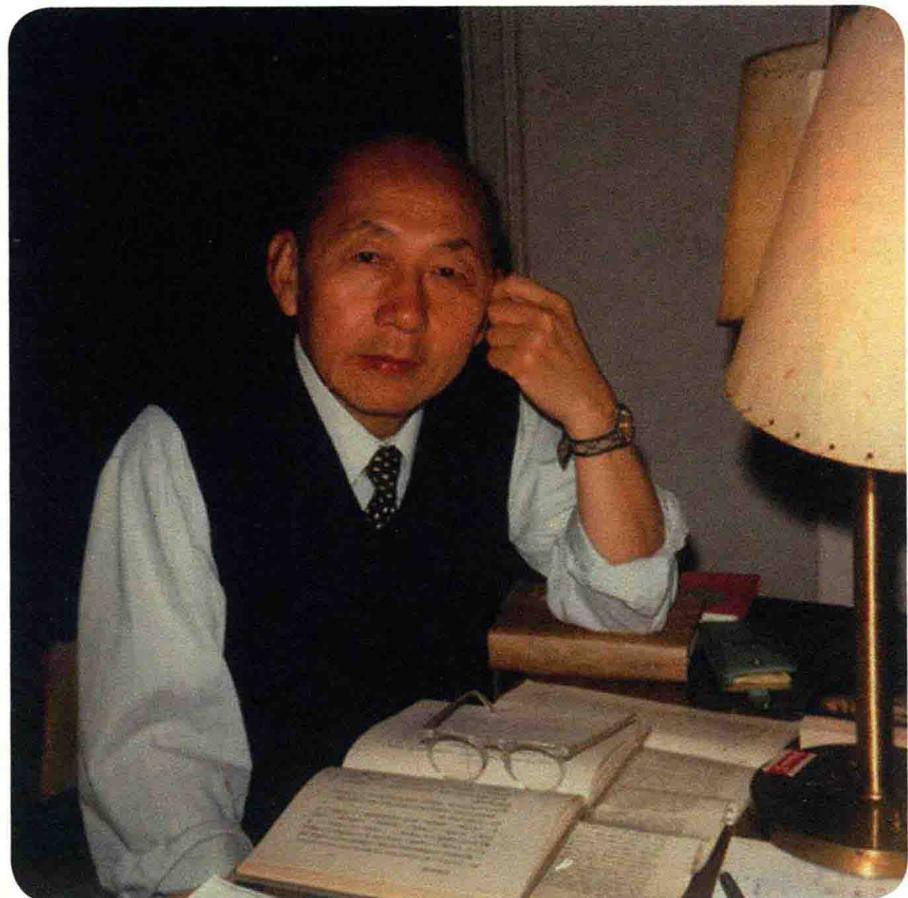
举报电话：010-62752024 电子信箱：fd@pup.pku.edu.cn

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出版部联系，电话：010-62756370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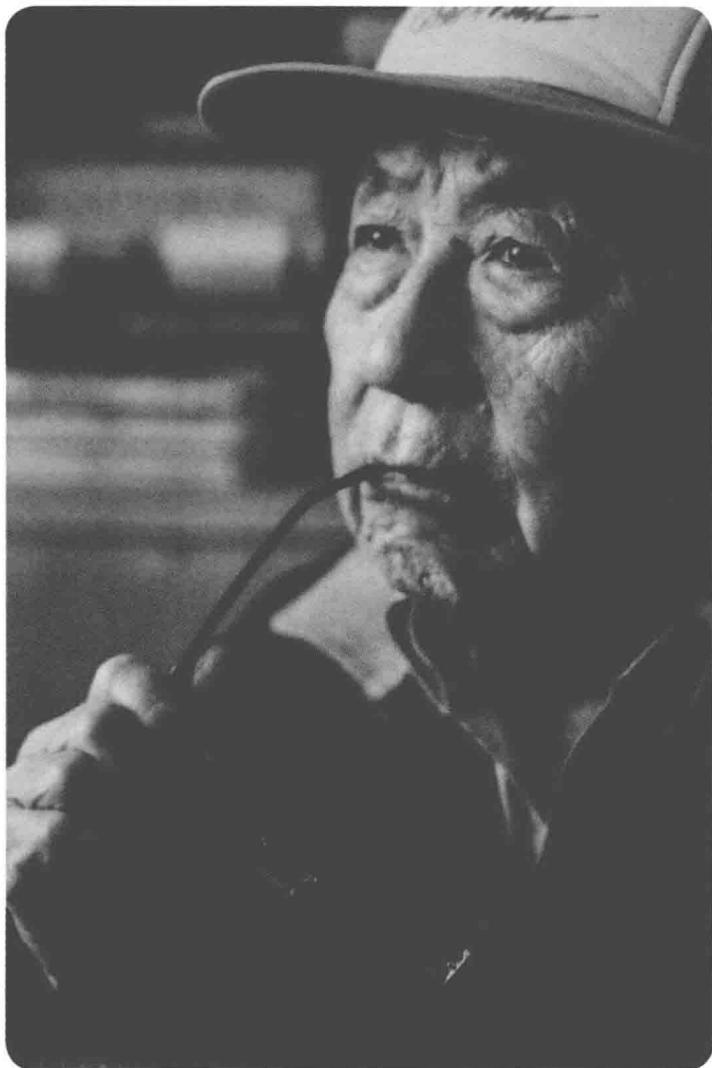




何兆武文集



1980 年代在美国



2005 年在清华（秦颖摄影）

目 录

辑 一

西方哲学精神	3
第一讲 西方哲学概述	3
第二讲 西方古代哲学	27
第三讲 中世纪和近代的西方哲学	52

辑 二

“从身份到契约”	
——重评梅茵的公式	79
卢梭和他的《社会契约论》	94
卢梭《论科学与艺术》及其他	98
激进与保守、革命与改良	
——读柏克《法国革命论》	108
评柏克的《法国革命论》	
——两百年后的再思考	114
关于柏克《法国革命论》	
——我的一点答复和意见	127
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	
——卢梭与柏克	131
自然权利的观念与文化传统	140

辑 三

孔多塞《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》译序	159
卡尔·贝克尔《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》译序	164
梅尼克《德国的浩劫》译序	166
读 G. E. 史密斯的《人类史》	179
盖伦和他的《科技时代的心灵》	183
原子、历史、伦理	
——读《费米传》书后	187
读杜兰《世界文明史》	195
谈有关西方文化史的介绍	201
当代西学翻译与出版的病灶	205
致孙开太同志书	209
记《中国思想发展史》阿拉伯文译本的出版	211

辑 四

“中学”与“西学”	
——从李陵说起	217
谈中学与西学	
——和清华大学中西文化综合班的谈话	223
中西文化与全球化	245
中西文化交流与近代化	261
中学、西学与近代化	272
展望新世界的和平和世界文化	
——在第 24 届世界和平国际会议上的发言	280

辑 一

西方哲学精神

第一讲 西方哲学概述

这门课讲三次，实际上是概述的性质，并不是一门整课，因为一门课要讲一个学期或者一个学年，现在我们只讲三讲。我考虑这三讲应该怎么讲，恐怕只能等于是个概述的性质。特别是我希望和大家能够有一个交流，所以一次两个小时，一个半小时我讲，半个小时大家提问题，免得像是灌输一样。如果灌输就意思不大了，教科书上都有，没有必要老师在这里灌输，最好是有一个交流。我想把这个课分成三讲，今天的第一讲序论，就是一个概述，或者说是一个前言，是一个引子，或者说是中国旧小说里的“楔子”。第二讲讲传统哲学、传统的西方哲学精神。第三讲是近代西方哲学精神。近代和传统之间应该划分为两个时期，为什么这样划分，我们下一讲再讲。今天就只谈西方哲学精神的绪论。本来这个课的名字不是我安排的，我假定同学们都没有正式上过西方哲学这门课，所以我从头来讲。至于“精神”这两个字却不是我加的，是安排课程的人加的。大概觉得加这两个字更好一点，其实讲的内容就是对于西方哲学的一个简单的介绍。今天讲的是绪论，讲一下西方哲学大概都是一些什么内容，再着重介绍一些参考书。

—

中国古代没有“哲学”这个词，我们中国古代叫做“道学”，有的叫做“理学”，也有的叫做“玄学”。“道学”就是讲“道”，实际上也是讲“哲学”，

但是中国古代叫做“道学”。后来有的叫做“理学”。“理学”就是“道学”。在魏晋的时候，大家讲“玄”，所以也叫“玄学”。我们到近代才用“哲学”这个词。这个词是从西方来的，源于希腊文的 philosophy，philo 是爱，sophia 是智慧，所以 philosophy 这个词从词义上来说就是“爱智”。在明朝末年的时候，这个词最早从西文翻译成中文，那个时候天主教的传教士把这门学问叫做“爱智学”或者“爱知学”。智就是知，智慧也要有知识，没有知识就不会有智慧。

大家知道，我们对于西方的知识有很大一部分都是清朝末年从日本转手而来的。19世纪60年代，日本经过了明治维新的阶段。日本原来和中国一样，也是一个闭关锁国、落后的国家，后来当西方的势力打进来之后，日本进行了变法维新，采取一种新的制度。所谓新的制度，简单地说就是学习西方，或者日本人所说的“脱亚入欧”。日本的明治维新成功了。中国到了19世纪末年（清朝末年）的时候，也觉得自己落后了，也要变法维新，那么就有个现成的样板，这个样板就是日本。所以中国的学生成大量去日本，结果从日本转手介绍了很多西学。一直到20世纪的30年代，我们有很多关于西方的知识，包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都是从日本转手的，所以很多词大多是从日本人那里转译过来的。

哲学的“哲”字，也是从日本人那里翻译而来的。日本人为什么叫它“哲学”，我不太清楚。不过中国有一句古话，叫做“知人者明，自知者哲”，你了解别人就是“明”，你了解自己就是“哲”，这就是中国俗语所说的“明哲”。为什么用“哲”这个字呢？我的推想是这样的：大家知道有一个故事，说是古希腊的时候，雅典有一个德尔斐（Delphi）神坛。这个神坛是纪念太阳神阿波罗（Apollo）的，是最有名的神坛。雅典人有什么事情往往就先到神坛去祈祷，神坛就给他一个神谕、一个指示。有人曾到神坛去祈祷，问：“谁是雅典最聪明的人？”神坛就传谕说：“苏格拉底是全雅典最聪明的人。”大家知道，苏格拉底（Socrates，公元前468—前399）是西方哲学的祖师，他的地位相当于我们中国的孔子，是最早、最大的圣人。苏格拉底知道这个说法以后，觉得他自己并没有什么学问，没有什么知识，为什么他是最聪明的人呢？他就跑去问了很多人，和很多人谈话，谈话的结果是他发现那些人一点知识都没有，但是都自以为自己非常有知识。他说只有我知道我自己什么都不知道，我知道我自己一无所知，在这一点上，

我比所有的人都聪明。所以苏格拉底的教训最重要的就是——你应该知道自己(know yourself)。大概哲学就是这么讲起来的。

西方哲学的精神和中国的传统精神有一点不同：中国传统精神特别注重伦理道德、特别注重一个人的修养和德性；西方的哲学传统相形之下似乎更强调的是认识，是知识和论证。应该指出的是，这两个东西并不是截然分开的，并不是说你重视知识就不要德行，有德行就不要知识，但是毕竟有所偏重。有的人更重视知识，有的人更重视德行。中国传统哲学精神始终似乎都是特别重视德行，而西方的传统更重视知识，这一点可以说是西方哲学的精神。

这里再说明一下，“西方”这个词，在过去，从19世纪一直到1949年，到我这一代作学生的时候，那时都叫做“西洋”，叫“西洋史”“西洋哲学”，而不叫“西方哲学”。“洋”字和“方”字的意思似乎有一点不同。你要说“方”字，那是个地理的概念，你在西方我在东方，这是地理的概念。如果说“西洋”的话，那是对“东洋”而言，“东洋的精神”“西洋的精神”，这里文化的涵义更多一点，不但有个地理的概念，而且是个文化的概念。但是1949年以后一般都用“西方”，不用“西洋”了。大家知道，你要说东方、西方，这两个词是eastern, western，如果带有文化内涵的话，那么东方是Oriental，西方是Occidental。

什么叫做哲学，我刚才介绍了第一种定义，哲学按字面说就是“爱智慧”，智慧就要有知识，所以任何知识都是哲学。在西方，一直到中世纪，学问叫哲学。所以一直到今天，很多的博士都是哲学博士(Ph. D.)，就是Doctor of Philosophy，还是在用传统的意义，就是什么知识都是哲学。后来科学发达了，哲学的地盘就越越来越小，因为知识都专业化，各个领域就都给别人了。但是哲学是不是还保留有它自己的领域呢？到了近代，就有了另外一种观念来界定哲学。我们对于外界有很多知识。比如说冰是冷的，火是热的，这是我们对外界的的知识。我们的知识就是科学，科学(science)一词本求就是指知识(scientia)。我们的科学可以说是我们的知识，比如说水到100℃就沸腾了，水到0℃就变成冰了，这是我们的知识。科学是研究什么的呢？科学是研究我们所认识的世界的。水也好、火也好、任何现象也好，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。就是说客观世界所存在的东西都是我们研究的对象，这个知识就是科学。那么应该还有一种学问，

这种学问的研究对象不是我们的具体知识,不是研究水在多少度结冰、多少度沸腾,这种知识所研究的对象就是我们的知识、我们的科学,这种学问就叫做哲学。换句话说,哲学是科学的科学(the science of science)。我们有各种具体知识,比如说我们对于人的生理的知识(the science of the body),或者我们对于地球的知识(the science of the Earth)。哲学的研究对象不是任何具体的知识,而是科学,就是研究我们的知识是如何成立的,这应该是两个不同的层次。

“哲学是科学的科学”或“研究科学的学问”,这个定义如果对于西方的某一派哲学来说,是很确切的。因为西方的哲学很多走的是知识的道路,或者说走的是逻辑的道路,走的是推论的道路。但是这个定义如果放到中国的传统中来说,就不太适合了。因为中国哲学强调的是道德修养。道德修养当然也可以作为一种知识来研究,但它本身不是一种知识。比如说《孟子》中讲人的道德是天生的,举了一个有名的例子:一个人看到一个小孩掉在井里,他马上就去把他拉上来。为什么去拉他呢,并不是因为你拉他,你就可以发财,也不是大家会赞美你,你就有了好名声。不是为了名,也不是为了利。你之所以要把小孩拉上来,孟子说是因为“恻隐之心,人皆有之”。“恻隐之心”就是同情心,这种同情心是天生的,是每一个人内心中都有的。道德是一种先天的东西。孟子仅仅举了这么个例子。中国的哲学不太追究例子能否成立,我们完全可以举出相反的例子。前几年报道了一件事,四川一个地方有人掉到水里,就呼救,岸边上的人先讲价钱,给多少钱才去救,不给多少钱就不去救。我们完全可以举和孟子相反的例子。换句话说,你的知识怎么样才能够成立,就是说,你这个推理是怎么成立的,这一点在中国不太重视,而在西方哲学中比较重视。这一点可以说是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不同。

二

下面,我要明确一个观念,就是从清朝末年起,一直到1949年,在中国的思想界有一个争论,争论中学与西学的关系。中国有中国的学问,西方有西方的学问。中学和西学是指什么,有什么关系?大家知道最有名的一个口号就是“中学为体,西学为用”,即“中学”是本体,“西学”是拿来

应用的。这个本体不能变，但是用起来还要用“西学”。这个理论最有名的代表人物是清朝末年的张之洞。这个理论虽然不是他首先提出来的，但是是在他那里成熟的。张之洞做过湖广总督、军机大臣，是大官僚，而且是清朝末年洋务派的代表。

18世纪末年，英国曾经派一个使臣马嘎尔尼到中国来见乾隆皇帝。当时英国已经是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贸易国家。马嘎尔尼到中国是希望打开中国的市场，他到中国来后就要求见乾隆。乾隆有一个谕旨，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天朝上国，是个大国，我们什么东西都有，根本不稀罕你们外国的玩意儿，如果我们允许你来，是表示我们的宽大，并不是我们需要你们什么东西。这是当时中国的心态。中国认为自己的文化在全世界最发达，中国不了解世界，对世界其他国家也看不起。

但是到了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，情况就完全变了。1840年的鸦片战争，中国打了败仗，不但割地、赔款，还五口通商，订了《江宁条约》，也叫《南京条约》。《南京条约》割地赔款，丧权辱国。鸦片战争之后，英法联军又火烧圆明园。本来圆明园是皇帝的行宫，按照清朝的体制，正式的宫殿在城里，就是今天的故宫。但是皇帝一年四季很少真正住在宫里，都是住在别墅。这相当于法国的凡尔赛宫，本来是皇帝的离宫。他住在这里，因为这里面有风景，住在宫里面没意思。所以除了重要的事情，如过年、大典，他才住在宫里，一般他都住在圆明园里。圆明园被烧了之后，慈禧太后就扩建颐和园，慈禧大部分时间都在颐和园里。所以戊戌变法的时候，光绪每天要跑到颐和园去向慈禧请示。接着，中国连续打败仗，一直到最后八国联军把北京都打下来了。

这个时候，很多人都觉悟到中国的体制不改不行了，还是原来的老一套，不能够应付现在的世界。所以中国也想变法维新，最有名的就是1898年康有为的戊戌变法。戊戌变法最重要的内容就是要学习西方的体制、思想和学术。当时中国很多人都想，中国为什么会失败呢？中国是一个天朝上国，为什么会打不过洋鬼子？因为洋人的船坚炮利，它的船结实，它的炮厉害，中国没有船坚炮利，所以会失败。中国要打败洋鬼子，非得也船坚炮利不可。所以当时的口号叫做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”。“师夷”就是把夷人当作老师，学习西方的长技、优点来对付西方人。师夷之“长技”是什么呢？无非是船坚炮利，所以中国一开始也得学“船坚炮利”，没

有船、没有炮，你就没有办法对付外来的侵略者。但是经过了一段时期以后，就觉得光是船坚炮利并不够，因为船坚炮利得要有基础知识。数学、物理、化学知识都没有，你怎么造船造炮。造火药要有化学知识，造船、开炮总得有点物理学、数学的知识。所以基础的科学知识还是需要的。戊戌变法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的认识又进了一步，光是学习西方的技术也不行，光是学习西方的科学也不行，因为科学和技术是一定社会条件下的产物，社会体制若是和它不配套，你就不可能有孤立的科学和技术。科学技术是社会的产物，必然要求社会制度与之配套。可以说，它是一套系统工程。比如过去是科举制度，要背四书五经，考及格就可以做官发财，否则一个知识分子就没有出路。所有的知识分子都学习四书五经，好不好是另外的问题。但是这个东西没法现代化，你就把经书背得烂熟也不能建立起一个现代化的国家。要建立现代化的国家一定要有现代的科学技术。那么我们的教育、考试体制就得变，所以后来就废科举、兴学校。废科举就是不采用八股文的考试形式，而是建立现代化的学校，包括京师大学堂，那是戊戌变法的产物。这已经认识到社会体制的改变才是关键所在。

但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，中国人的认识又提高了一步，就是认为社会体制的改变还不够，我们的思路或者说思想方式也要改革或革新。所以，从清朝末年起，西方的哲学、文学就开始进入到中国来，因为没有这些东西也不行。你不能只学他的物理或数学，数学和物理也不是孤立的，是和整个社会与思想意识配套的。社会也不是孤立的，它还有思想背景，你得有一套思想背景和这个社会配套，这个时候就出现了“中学”与“西学”之争。“中学”就是指中国传统的学问，孔孟之道，讲仁义道德。“西学”是什么？最开头是声光化电，后来内容也不断地改变。我们刚才讲了提出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口号的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就是张之洞。“中学为体，西学为用”，就是说，中国传统政治社会体制还是不能变，叫做“中学为体”，把“中学”作为一个体，把“西学”作为一个用，我们应用的技术是“西学”，但是我们的“体”还是要保持中国的传统之体。这个“体”究竟指什么东西？我觉得在“张之洞”的理解里是非常明确的，那就是中国传统的“三纲五常”：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。比如专制君主是神圣的，他是绝对的权威、绝对的领导，所有的臣民都应该服从他，都应该向他效

忠，这就叫“君为臣纲”。因为这个体制一变的话，他的政权就没有了。当年戊戌变法的时候，梁启超提倡民权。当时戊戌变法有一个中心在湖南，湖南巡抚是陈宝箴，他是在全国最早推行新学的当权者，在湖南办了一个学堂叫时务学堂。“时务”意思就是注重现实，反对传统的经书，请了梁启超做总教习。梁启超提倡“民权平等之说”，认为人民有权，应该平等，遭到反对派的攻击。他们反对说，“民有权则君无权矣”，问题在于权究竟应该归谁，提倡民权，那么皇帝还有没有权？在他们看来，君为臣纲，皇帝的权是绝对的。换句话说，他们要维护君主专制的制度，所以权一定要归皇上，而不能归下边。

这一点要附带作一个说明。我们的思想往往只能采取语言的形式，我们用语言来表达思想。可是用语言来表达，也有一个缺点，就是往往内容已经变了，可是我们的语言还没有变，所以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理解的问题，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说，就出现了一个解释学的问题。语言是同样的，可是内涵已经完全不同了。比如在经济学里面，早些时候，“保守”指的是要求完全由市场来调控经济，反对一切国家的干预。凯恩斯主义盛行很长时期，变成经济学的主流后，“保守”指的则是坚持认为必须有国家力量的干预，经济领域不能完全由市场说了算。字义完全不变，可是内涵却完全不同了。中学与西学的问题也有这个问题。

什么是中学？什么是西学？再作一点更多的解释。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，冯友兰先生（现在已经去世了）在清华教中国哲学史，写了一本《中国哲学史》，是当时有名的学术著作，也是当时我们的标准教材。写完之后，学校要两个老师写审查报告，这两位老师，一个是陈寅恪先生，是老一辈史学家，另外一个是金岳霖先生，是老一辈哲学家。金先生有一段话，我现在介绍给大家，借以说明这个问题。金先生说：有没有一个东西叫做“中国哲学”？我们说有一个人写了一本书，叫做《英国物理学史》，那么是不是有一个东西叫做“英国物理学”？严格地说，没有一个东西叫做“英国物理学”，因为我们没有所谓“法国物理学”“德国物理学”，也没有“中国物理学”。物理学就是物理学，没有所谓“英国物理学”。那么“英国物理学史”这个意思是不是不通呢？也通。这个所谓的“英国物理学史”确切的意思是指物理学在英国发展的历史，而不是有一个东西叫做“英国物理学”。这个分辨是很值得我们思考的。并不存在英国物理学，全世界